

杜进主编
金松林 胡继华 副主编

Kua Wenhushiye Zhong de Bijiaowenxue

科学人文艺术教育系列丛书

跨文化视野中的 比较文学

人文教育国家特色专业
人文教育国家教学团队 建设项目研究成果

科学人文艺术教育系列丛书

跨文化视野中的 比较文学

杜进 主编
金松林 胡继华 副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出版集团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选题策划:杜国新
封面设计:宋文岚

责任编辑:张旻
责任校对:方贵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杜进主编.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7
ISBN 978 - 7 - 212 - 03631 - 7

I . 跨… II . 杜… III . 比较文学—研究 IV . I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771 号

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

杜进 主编

金松林 胡继华 副主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230071

发 行 部:0551 - 3533258 3533292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960 1/16 印张:12.5 字数:224 千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212 - 03631 - 7

定 价:23.00 元

总序

追求真善美 塑造和谐人

汪青松*

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个体生存需要和世间幸福,而应是追求人文精神,直面永恒生命的意义。安庆师范学院人文教育专业弘扬百年办学传统,彰显“文化育人”办学特色,高举“追求真善美,塑造和谐人”的旗帜,科学教育求真,人文教育求善,艺术教育求美,努力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复合型应用性人才。

人类知识结构原本是融为一体,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和数理逻辑均以“智慧之学”而被包含在早期的人文教育之中。只是随着人类知识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发展,人类的精神财富才被分门别类,形成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分科之学和大学的专业教育。分科之学和大学专业教育极大地促进了科学与教育的发展,但也存在人文教育被专业教育遮蔽、大学教育受到专业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限制的问题,在单一的专业化教育占主导的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往往是“单向度的人”。纽曼说,把传授局限于某一种技艺的研究,每一种技艺都会提高,但是被局限于该技艺的个体却因此退化了。从当代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向看,学科分得越细,对跨学科综合的要求就越强烈,人文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灵魂就越是重要。只有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才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是我们开展人文教育的宏观背景。

把人文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通识基础,能更好地发挥专业教育的功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不仅具有宇宙宗教的情怀,而且是音乐天才。

* 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特色专业、国家教学团队、国家精品课程主持人。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的硕士学位是行政学,但他尊孔子为精神导师,认为自己一生中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对《论语》中的很多教诲如数家珍。人文教育的国际化是我们高师院校开展人文教育的又一根据。

我国基础教育过去长期实行分科教学,不利于人才的综合创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急需高师院校培养能开设综合课程的师资。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这一需要,是我们人文教育专业及人文教育教学团队建设的第三动因。

2000年9月,安庆师范学院实施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师范院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从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三个专业新生中选拔58名学生开办了第一届综合文科实验班。在综合文科改革中,实验班开设“拼盘式”、“整合式”、“菜单式”、“融合式”课程,建构“夯实基础、综合拓展、活动创新”教学框架,培养大学生“四成”即成长、成人、成才、成功。经过四届综合文科实验,2004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安庆师范学院开办人文教育专业,同年该专业就被评为安徽高校省级教改示范专业。

在安徽高校省级教改示范专业建设中,安庆师范学院人文教育专业努力实现“三个领域,九个方面”的示范,即:在课内实现“综合示范”、“通识示范”和“人文示范”,在课外实现“实践示范”、“创新示范”和“能力示范”,在校内外实现“教改示范”、“教研示范”和“‘四成’示范”。

在人文教育专业建设取得成果后,我们又推动学校组建科学教育专业,引领创建艺术教育专业,构建起科学、人文、艺术三大通识课程平台。人文教育专业教学团队开发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安庆师范学院与皖江文化”、“中西文化的人文精神”、“从方以智到邓稼先”和“从严凤英到韩再芬”等课程,形成了“通识为基、能力为本、人文为魂、服务为重”的课程体系。“通识为基”课程模块主要为师范生奠定善于教书的基础,“能力为本”课程模块使师范生能教书和会教书,“人文为魂”课程模块旨在提高师范生的人文素质,“服务为重”课程模块引导师范生立足地方、服务基层。“通识为基、能力为本、人文为魂、服务为重”的课程

体系,是人文教育专业建设的成果,已被确立为学校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指导思想。2007年,安庆师范学院人文教育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特色专业;2008年,安庆师范学院人文教育团队被评为国家教学团队;2008年,安庆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追求真善美,塑造和谐人”,是安庆师范学院人文教育特色专业建设始终高举的旗帜。在专业实践中,融合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艺术教育三大教育,以“真善美”的教学内容,塑造身心和谐的大学生,培养“求真、务善、完美”和谐之人;融合“三个课堂”,即以第一课堂理论教学增长大学生专业人文知识,以第二课堂社团活动强化大学生自主活动的人文能力,以第三课堂实践教学提升大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和谐之人;融合专业师资、跨学科师资和校外师资三支队伍,引导大学生乐于学习、善于思考、勤于实践,培养“学习、思考、实践”和谐之人。彰显人文教育,弘扬人文精神,将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当做专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旨在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理解人生、尊重他人。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科学人文艺术教育系列丛书》,是安庆师范学院“文化育人”办学传统和“特色兴校”战略成果的展示,具有人文性、综合性、创新性、教育性、学术性和地方性特点。目前,学校已开发和出版的校本及地方特色课程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中学文科教学通论”、“人文科学概论”、“安庆与中国近代化”、“陈独秀与近代中国”、“安庆师范学院与皖江文化”等。这些学术成果有的属于学理思考和教学智慧的总结,有的属于实践教学和理论创新的展示。“十一五”期间,安庆师范学院还要开发和出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十二观》、《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中西文学的人文精神》、《中西历史的人文精神》、《中西哲学的人文精神》、《人文教育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案例教程》、《从方以智到邓稼先》和《从严凤英到韩再芬》等特色校本教材,为“追求真善美,塑造和谐人”奉献我们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教育本来就是人的教育。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我国学者认为，教育一旦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灵魂或人的精神，严格说来就不成其为教育。2008年7月7日，我在学校人文教育特色丛书审定会上提出，古今中外文史哲上的人文思想很多，要全面辩证地把握。关于对人文的理解，至少要把握十对关系：(1)自然人与社会人；(2)个体人与集体人；(3)经济人与道德人；(4)神性人与理性人；(5)异化人与自由人；(6)病态人与健康人；(7)工具人与目的人；(8)单面人与和谐人；(9)地域人与全球人；(10)认知人与实践人。我们不能简单罗列或展示中外历史上人文传统，而要按这十对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和正确评说，做出自己的积极判断，其价值导向落实到对这十对人文关系的处理上，要反思前者，倡导后者，引导学生学做社会人、集体人、健康人、道德人、全球人、实践人、和谐人。这是宏大而神圣的工程。我期待着《科学人文艺术教育系列丛书》有精彩阐释这十对人文关系的新作面世，更期待着安庆师范学院人文教育国家特色专业和国家教学团队在大家的关心和支持下不断成长！

序

胡继华 *

谈起“比较文学”，人们马上有两种典型的心理反应：熟悉感与警惕性。

先说熟悉感。人们觉得“比较”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以说我们再也熟悉不过了，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独特的方法。因识之故，意大利式新黑格尔主义美学家克罗齐坚决反对将“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美学或者文学研究中。问其究竟，克罗齐确实持之有故。早在罗马时代，帕米拉政治家和修辞学家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 213 – 273)在他的传世之作《论崇高》里就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比如他说《伊利亚特》是荷马的青春之作，而《奥德赛》则是荷马的暮年吟咏；比如他还说德摩斯梯尼(*Dēmosthēnes*)的风格像疾雷闪电，而西塞罗(*Cicero*)的风格则如野火燎原。

次说警惕性。提起“比较”，人们很担心其结果是必至褒贬，高低有别，在追捧一些作家或者文学现象的同时，必定会打压另外一些作家或者文学现象，而这最终有悖于公正。凭什么倾听一批人的声音而拒绝对另一批人的声音做出应答呢？拒绝应答，就是一种不负责任，“比较”是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判断，并依据这种判断来评判历史与人？更为令人忧虑的，还是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对“比较文学”的一个控告——“比较”蕴含着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韦勒克看来，像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就有通过文学关系研究来记“文化贸易”账目的嫌疑。20世纪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兴起，则放大了对于“比较”的忧虑，以至于人们普遍以为，如果不超越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视野，一切比较都不是强固文化帝国的霸权，就是发泄文化宗主国的怨愤。所以，不难理解，对于“比较不是理由”这个否定性命题，尽管人们可以做

* 胡继华，1962年生，安徽太湖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教授。现供职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主要从事西方哲学、文艺美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成果有专著《宗白华：文化幽怀与审美象征》、《后现代语境中伦理文化转向——论列维纳斯、德里达和南希》、《重建巴别塔——解构诗学新论》，译著《为承认而斗争》、《友爱的政治学》、《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等。

出各种各样的阐释,但它的核心命题则可能是质疑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合法性,以及“比较”作为一种方法的有效性。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理论建构意味深长地同“比较”接下了深厚的渊源。因为 20 世纪的文化经验起码是西潮激荡下的民族精神的觉醒,其中至少有三种声音在对话,三种经验在对话中共生:正在衰落却残韵悠扬的古典文化经验,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确立了话语权力的西方文化经验,以及在文化压力之下艰难地生成的现代中国文化经验。从这复杂的文化经验浮出表面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景观就是“比较”研究的一个生动的个案。对西方文化经验的怨恨与向往,对古典文化经验的回眸与诀别,现代文化经验的裂变与整合,全部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以及文化的异质与同质的互相渗透,都给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者提出了诸多值得深入透视的问题。

当我们回顾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历程时,一些独特的思考对今天的研究依然是一种激励。美学家宗白华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生命哲学的视野下对中国诗学精神的阐释,以及以这种阐释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精神审美维度的建构,事实上为比较文学研究通往的跨文化研究开启了一条生路。比如他通过对比中西诗画中不同的空间意识,而得出了音乐性和节奏感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的结论。“‘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所以儒家哲学也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易》云:‘天地𬘡缊,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的最后根源。”这是以西方的生命哲学来重构中国诗学和文化精神。再比如,他还引用蔡小石《拜石山房词》和江顺诒对之的评点,论说了艺术意境之“气胜”、“情胜”和“格胜”的三个境界,并指出西方艺术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和后期印象派分别对应于意境的“气”、“情”、“格”三层。对此,台湾学者、诗人杨牧结合宗白华的歌德论做了引申,并指出:歌德笔下殉美的少年维特,由希腊悲剧脱胎而来的伊菲格尼,以及将小我推及大我并象征着欧洲近代文化灵魂的浮士德,分别对应于“情胜”、“气胜”和“格胜”。而这是以中国古典诗学概念来点评西方艺术与文学。不论是以西方精神为视野反观中国古典,还是以中国古典精神为棱镜透视西方艺术,宗白华都为我们草创了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典范。

重访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历史,追忆清末民初一辈学者的开放心态和淑世精神,非常有助于我们走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窠臼,通往全球时代跨文化的比较文学景观。王国维将叔本华的悲剧观念和席勒的审美学说应用于中

国古典文学的讨论,朱光潜对克罗齐的直觉论的吸纳及其对中国诗学的参证,钱钟书博览全书、在中西方文学中极力辨异求通的努力,李长之借取德国古典哲学批判五四之“清浅”而重构中国古典文化品格的成就,都为我们在全球文化景观下审视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提供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思想资源。在 20 世纪比较诗学走向上展开跨文化诗学研究的叶维廉主张,首先要超越“文化的模子”,然后在更大视野中去展开文化交流,互相调整和互相包容,去渐渐接近“共同的诗学”。不过,这种“共同的诗学”不是确立一种文化形态的权威去征服、剥夺另一种文化形态,而是平等尊重、对他者的文化做“知根知底的了解”。而这也正是德里达所一贯倡言的“对他者的绝对责任”,一种作为不可能的“正义”。在《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中,叶维廉所选择的个案更是意蕴深广。通过对观华兹华斯的《序曲》和王维的《鸟鸣涧》,他揭示出西方诗人和中国诗人“感物方式”的差异——一个是“以我观物”,诗人主观意识的介入而让山水景物丧失了直接性与具体性;一个是“以物观物”,诗人不以主观情绪或知性逻辑去干扰山水景物,山水自然兴现,透明无碍。通过进一步追问支配中国古典诗人观物方式的哲学观念,他阐发了中国古代道家“目击道存”、“山水即天理”的自然意识。通过考察西方宇宙观的现代演变及其英美山水诗审美视像中的呈现,他辩护了中国古典诗学精神的现代生命力,暗示了道家艺术精神在全球时代汇通和融构“共同诗学”的可能性。

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策略反应。什么是全球化?当代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a Appadurai)指出,全球文化互动中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与文化异质化(cultural heterogenization)之间的张力”。换句话说,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另一方面是民族化;世界一方面在迈向同一,另一方面又在增殖差异。同质性和异质性是全球过程的两个侧面,它们持续不断地斗争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表演断裂和差异的生动舞台。这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展开,既要把握文学和文化经验中所表现的精神同构现象,又要发掘民族文学与文化经验的独特性,尤其是伦理和审美维度的异质性。

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在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往返寻求。这就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伦理自觉问题。伦理的自觉,是指比较文学研究具有一种明确的伦理意识,以在不同的审美兴趣之间斡旋和实现审美沟通为己任。具体表现在跨文化实践中,就是比较研究要尊重他者的差异,实现一种相互通融彼此共在的生存状态。

尊重他者的差异,构成了社会生活中自觉调整人际关系的哲学公设,因而也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西方理论思潮在经过了语言论转向和修辞学洗礼之

后,在质疑文学理论和文化体制建构前提的自反思潮中,一种向伦理回归的倾向渐渐明朗起来。列维纳斯曾经设想“以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通过曝现他者的差异性,展开对西方理论建构中过分强烈的同质性的批判。这一思想对跨文化理论和实践造成了一种“他者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比较文学的内质和形态。从内质来看,比较文学再也不死守本质主义的窠臼,而是致力于解放文本的生命力,释放潜藏在文本之中的差异。从形态来看,跨文化研究克服了认识论批评、体验论批评、语言论批评等形态的偏颇,力求在多种批评模式之角逐中融合各自的优长,铸造一种修辞-文化论批评形态。同时,尊重他者的差异,寻求异趣沟通,体现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因而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脉重要的新近流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全球化进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这两种交织的发展潮流,与中国社会的全面分流和阶层的普遍分化趋势互相促进,审美趣味的差异涌动,形成了杂语共存的复杂局面。哪里有审美异趣,哪里就有审美沟通的要求。这就是从比较研究走向跨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前景之一侧。

眼下这本比较文学专著,题名就是《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我们的理论进路是以跨文化的方法来把握比较文学的历史命运和现代使命,并融合符号学、解释学和解构理论等新近思想资源,来改造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译介研究,我们试图在对比较文学历史脉络的直接把握上,以文化全球化为视野,以跨文化的中西参证为基本方法,通过个案来展开跨文化比较文学的景观。在这一过程中,比较文学的命运与文化危机的关联是我们始终关注的,因而,书中也波动着我们的某种忧患意识。可以说,在中国比较文学向跨文化研究的过渡中,我们的探索也是一种对文化全球化与比较文学自我超越趋势的顺应。

本书作为教材,不仅为人文教育专业所用,对于中文、外文、新闻传播、历史等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全球时代文化转向的趋势,明确文化同质化和异质化是全球时代的基本矛盾,理解杂语化韵和异趣沟通构成的现代审美文化精神,并以此为基础明确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问题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对于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会计学等专业的学生,也可以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增强学科“文化意识”、“比较意识”和“批评意识”,更新思维方式,拓宽观察视野,丰富专业知识的内涵,从而使人文素养得到更大的提高。

目 录

总序	汪青松	1
序	胡继华	1
第一章 比较文学在危机中诞生		1
一 比较文学的发端		1
二 比较文学的危机		3
第二章 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14
一 法国学派		14
二 美国学派		17
三 中国学派		21
第三章 影响研究		26
一 影响的概念		26
二 影响即误读		33
三 影响的方式		37
四 影响研究的主要范畴		41
第四章 平行研究		47
一 平行研究的内涵		47
二 平行研究的基本方法		52
三 平行研究的基本要求		56
四 平行研究的主要范畴		58
第五章 媒介和译介		69
一 媒介与文学传递		69
二 文学译介与比较文学		73
三 文学翻译在中国		77
四 文学翻译在西方		92

第六章 翻译研究	102
一 语言学派	102
二 文化学派	105
三 解构主义翻译	107
四 后殖民主义翻译	112
五 女性主义翻译	114
第七章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	117
一 形象学的发生与发展	117
二 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范畴	122
三 形象学研究的主要范围	135
四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143
第八章 跨文化文类学研究	147
一 文类学研究的历史	147
二 文类学的研究范围	154
三 缺类研究	162
第九章 中西叙事文类的比较	166
一 中西叙事文类渊源	166
二 中西叙事文类形态	173
参考文献	181
后记	杜进 189

第一章 比较文学在危机中诞生

从 19 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首次亮相至今,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比较文学已由隐而显,从一株幼苗长成了一棵蓊蓊郁郁的参天大树。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在学科发展的途中就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自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和美国著名比较学者韦勒克 (René Welleck) 先后发难以来,比较文学就一直笼罩在危机之中。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文化转向和全球化浪潮中,比较文学在领纳新的学科使命的同时,又再次遭遇新的风险。本章将在简要回顾比较文学发端的基础上,对比较文学所历经的重重危机展开比较深入的探讨。

一、比较文学的发端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1816 年,法国一位名叫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ncois Noël) 的中学教师和他的朋友合编了一套供小学生选读的丛书,他们以“比较文学教程”作为这套丛书的总题目。这套丛书面世后,不久就遭到法国著名比较学者布吕奈尔 (P. Brunel)、比叔瓦 (C. Pichois) 和卢梭 (A. M. Rousseau) 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这个名字只不过是个幌子,因为这套丛书仅仅是将法语、拉丁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课文汇编起来而已,根本就名不副实。^①

在法国,比较文学的真正创始人是阿贝尔·维尔曼 (Abel Villemain)、让-雅克·安培 (Jean-Jacques Ampere) 和菲拉莱特·查斯勒 (Philarète Chasles)。维尔曼从 1828 年夏天开始,在巴黎大学运用比较的方法讲授法国文学。在讲课的过程中,他论证了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 18 世纪法国文学在意大利的影响。后来,他的讲稿被陆续整理发表,在第四卷前言中,他使用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雅克·安培是大发明家安培 (Andre-Marie Ampere) 的儿子,早在 1826 年 10 月 26 日给朋友的书信中,他就表达了自己想献身于“各种诗歌的比较文学”的美好愿望。1830 年,安培在法国一所自由学院开设了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两年以后,他在巴黎大学作了题为《论中世纪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报告,

^① 布吕奈尔等,葛雷、张连奎译:《什么是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 页。

他在报告的结尾部分大声疾呼：“先生们，我们进行了这种比较研究，没有这种研究，文学史是不完善的。而假如我们经过比较以后，茅塞顿开，找到了外国文学在某一点胜过我们的文学，我们有见地并公开地承认人家的进步，而我们会以做这样的人而感到无上光荣，会以这种离经叛道而引为自豪。”^①1848年，安培在法兰西学院院士授职欢迎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中，又再一次强调我们必须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查斯勒是法国《北方杂志》的发起者和创始人之一。1835年1月17日，他在巴黎中学讲课的开幕式上所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的，真正的孤立是死亡。……一切没有和其他人民进行文化交往的人民，只不过是大网上的破眼而已。”^②他并不主张搞文学上的孤立主义，对不同民族文学上的影响极为重视。正是通过他们的积极倡导，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概念呼之欲出。

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后发和次生的学科在19世纪末开始登台亮相。首份比较文学刊物的创办、首部比较文学专著的出版以及首个比较文学讲席的设立，成为比较文学诞生的标志。1877年1月15日，匈牙利的雨果·梅尔兹(Hugo Meltzl)和他的朋友萨缪尔·布拉塞(Samuel Brassai)在布达佩斯共同创办了《比较文学杂志》(后改为《比较文学报》)，尽管该刊发行十年后就匆匆停刊，但这份刊物对匈牙利比较文学的发展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培养了一批比较学者和对比较文学感兴趣的读者。1886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以“比较文学”为名，出版了比较文学史上首部学术著作。在书中，他用比较的方法详细探讨了世界不同文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共同规律。法国比较学者保尔·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后来在他那本享誉世界的《比较文学论》中，把波斯奈特《比较文学》一书的出版形容为划时代的事件。1897年，法国里昂设立了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席。约瑟夫·戴克斯特(Joseph Texte)被邀请并担任了首任比较文学教授。与此同时，许多大学如美国的哈佛、瑞士的苏黎世都开设了比较文学讲座。18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率先成立了比较文学系。比较文学由此踏上了漫漫征程。

比较文学的诞生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形成的结果，同时与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不无联系。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

^{①②} 布吕奈尔等，葛雷、张连奎译：《什么是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疆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只要谋求发展,就不得不主动融入这一全球市场。在这一新的空间中,展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比较文学在19世纪末的勃然兴起与这一背景有着紧密的关联。此外,比较文学的产生还直接受益于比较生理学、比较解剖学、比较语言学等相邻学科。这些名之以“比较”的新学科在研究方面有着共同的倾向,即通过对不同族群的比较,揭示以前未被人们所关注的群体间潜藏的亲缘关系和发展中的联系。如研究猿与人之间的关系,证明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研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民间语言与作家作品的关系,进而探讨两者之间的影响和承传关系。这些学科的发展为比较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比较”是这些学科普遍采用的基本方法,作为跨国或族际之间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顺理成章地从这些学科中借鉴和挪用了这一方法并作为学科的基础。然而,成也比较,败也比较,恰恰是这一方法掀开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②

二、比较文学的危机

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至少经历过四次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一方面延缓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敦促我们通过其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反思,深化了对这一学科的认识。为此,对这些危机展开较为详细的探讨,具有一定的意义。

克罗齐是比较文学的第一个“捣蛋鬼”。他对比较文学的否定,就是拿“比较”二字开刀的。他认为,比较这一方法并非比较文学所独有,任何学科都可以使用。因此,比较不能作为其学科独立的基础。从方法论层面说,“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也“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由于克罗齐的学术地位,他的反对在意大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何比较文学在意大利长期陷于困境的关键原因。意大利学者本纳第托在其《世界文学》一书中不无沮丧地表示,他和他的同龄人在少年时期曾盼望比较文学在他们的祖国开花结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8页。

^②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8页。

的愿望彻底破灭了。有学者认为克罗齐是与比较文学公然为敌,是想将比较文学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是比较文学的首次危机,所质疑的其实是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合法性问题。

针对克罗齐的发难,不少法国学派学者主动站出来为比较文学辩护。其中,以保尔·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1871—1948)和马·法·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1921—)最为有名。他们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反对将“比较文学”当做“文学比较”,“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成为他们抵抗克罗齐恶意攻击出奇制胜的名言。既然反对者集中非难的是“比较”二字,那就不如将其抛弃掉,用“关系”一词取而代之。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将比较文学的重点放在“比较”上,而更多地去探讨各国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指出:“那‘比较’是只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性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文章等并列起来,从而证明它们的不同之处,相似之处,而除了得到一种好奇的兴味,美学上的满足,以及有时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是没有其他目标的。这样地实行‘比较’,养成鉴赏力和思索力是很有兴味而又很有用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历史的含义;它并没有由它本身的力量使人向文学史推进一步。”^①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基亚也一再宣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②他们通过巧妙的转换,避开了批判的锋芒,使比较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比较文学的危机就已彻底根除,20世纪50年代末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展开了新的批判。

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教堂山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大会上,韦勒克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主题演讲。他在发言中直率地说:“比较文学在其方法和关于方法论的思考上已经成为一潭死水。”^③具体来说,那就是“人为地划分题材与方法,机械地理解来源与影响,受文化民族主义支配的动机,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气度有多么宽宏——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比较文学历史长久的危机的症状”^④。此言一出,又给刚刚走出阴霾的比较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究其实质,它凸显了三大征兆:第一,在题材和方法方面,“我们怀疑梵·第根试图区别‘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尝试能否成功”。任何“想把‘比较文学’限于两种文

^① 梵·第根,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页。

^② 基亚,颜保译:《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③ 韦勒克,张金言译:《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④ 同③,第275页。